

粉丝文化，网络民族志研究与反身性再思

葛 亮*

摘 要：粉丝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勃兴的跨学科领域。然而无论是早期对于粉丝/受众能动性的强调，还是近年来对于粉丝群体内部多样性和权力关系的考察，以及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在（跨）文化空间中的角色的观照，粉丝研究内部都潜藏着对于方法讨论的排斥。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被不同的粉丝文化研究学者调用。然而对于粉丝文化的数字化如何对民族志方法提出挑战，研究者在纷繁且充满异质性的粉丝社群中如何反思自身位置性和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则少被谈及。本文则回应了上述两重关切并强调：第一，网络民族志对于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的考察应当细致地检索其中多质性的网络和体察粉丝实在的生命体验；第二，反身性在粉丝文化研究和网络民族志中占所重要位置，研究者应当运用反身性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透明化，明确知识生产中的主观性。

关键词：粉丝文化 网络民族志 异质性 生命体验 学术粉 反身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乔安娜·鲁斯^①、亨利·詹金斯^②、康斯坦斯·彭利^③等欧美学者对于粉丝身份与群体、粉丝文化和参与的关注，逐

* 葛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系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文化社会学、性别、流行媒介与流行文化。

① Joanna Russ, *Magic Mommas, Trembling Sisters, Puritans & Perverts; Feminist Essays*. The Crossing Press Feminist Series. Trumansburg, New York: Crossing Press, 1985, pp. 79 - 100.

② Henry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1 - 8.

③ Constance Penley, "Feminism, Psychoanalysis, and Popular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Lau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Paula Treich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479 - 500.

渐催生了粉丝文化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早期的研究多关注粉丝参与的能动性,如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①中讨论系列电视剧《星际迷航》的同人粉丝群体如何在再创作的同人小说文本中重塑男性气质。这样的研究路径承接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中以斯图亚特·霍尔、大卫·莫利、安吉拉·罗宾等学者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身份与权力结构的探索。^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带有精英主义地对于文化工业的拒斥和将受众视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以霍尔对于电视观众和传播的编码/解码模式研究^③为转折点,文化研究将重心移至媒介与文化消费中的受众的能动性和多样化上。紧接着,大卫·莫利对英国广播公司(BBC)时事新闻电视节目 *Nationwide* 的观众的研究进一步聚焦于观众的解码如何在社会文化的权力空间中进行,并强调观众本身的能动性在意义生产中的重要性。^④莫利的研究同样也开启了文化研究由此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⑤,如多罗西·霍布森^⑥在1982年对于电视剧观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走进田野的空间内,与受访人一起观看,霍布森强有力地揭示了观众如何有意识地基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具体的家庭境遇挪用和解释文本。粉丝研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研究对于受众能动性的讨论,并置于粉丝文化和社群的框架内,讨论其内部的多样性差异与所在的社会文化权力结构的关系。^⑦而与此同时,粉丝与受众的界限也在逐渐

① [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75-209页。

②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et al,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 - 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5.

③ 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edited by Ann Gray,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386-398.

④ Davi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pp. 134-135.

⑤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33-68.

⑥ Dorothy Hobson,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1982, p. 34.

⑦ Jonathan Gray, *Dislike-minded: Media, audiences, and the dynamics of tas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26. Stanfill Mel, *Exploiting fandom: How the media industry seeks to manipulate fans*.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9, pp. 1-20. Zhang Weiyu, *The Internet and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China: Fandom public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24-141.

模糊，即乔纳森·格雷等人所言的社会生活的粉丝化^①。粉丝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领域，不仅仅有来自媒体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讨论，还逐渐融入了包括文学、数字人文、信息科学、心理学等方向的探索。在中文语境中，近年来对于粉丝研究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并呈现更多的关注视角，如粉丝的情感劳动、粉丝圈层之间的冲突、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张力关系等^②。

正如文化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族志转向，粉丝研究本身也有着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民族志的传统，包括以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参与进入粉丝社群的探索^③，也包括更宽泛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如使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走进不同的粉丝群体和其不同形式的参与。然而，粉丝文化参与形式从早期的粉丝同人志和粉丝集会逐渐转变到数字空间，粉丝活跃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与无尽的线上粉丝站点。粉丝社群的数字化趋势本身对于粉丝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许多挑战。然而，正如埃文斯和玛法尔达在《绝望地寻求方法论：粉丝研究的新方向》^④一文中所说，粉丝研究本身存在对方法讨论的排斥。相应地，这样有意无意的拒斥或忽视，造成包含研究者本身的位置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何以切近并保护研究对象、何以确认和保有研究对象的多质性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悬置在当前粉丝文化研究之上。

在此紧迫性下，本文试图处理两个核心命题：其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如何运用至基于网络空间的粉丝社群研究中；其二，反身性在粉丝文化与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的中心性和研究者如何处理反身性。

① Jonathan Gray, Sandvoss Cornel, Harrington C. Lee, et al, "Introduction: Why Still Study Fans?", *Fandom, Second Edition: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6.

② 许冠文、张慧：《“嗑 CP”：青年女粉丝的创造性情感体验》，《妇女研究论丛》2023 年第 1 期。杨玲：《撕：网络圈层冲突中的语言操演、认同建构与性别鸿沟》，《文化研究》2020 年第 1 期。郑熙青：《想象“耽美”：无法破壁的亚文化资本和耽美亚文化的合法性悖论》，《跨文化对话》2018 年第 2 期。

③ Camille Bacon-Smith, *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pp. 141-174.

④ Adrienne Evans, Mafalda Stasi, "Desperately Seeking Methodology: New Directions in Fan Studies Research", *Participations*, 2014, 11 (2), pp. 4-23.

一、网络民族志与粉丝文化研究：多质性网络与实在的生命经验

数字化的粉丝文化空间本身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社群站点，而是不同粉丝（亚）社群的松散的集合。一方面，特定的站点，如某个具体的同人粉丝线上社区，包含了不同的亚群体，并且不只囊括发布的同人作品，更容纳了粉丝之间超越同人作品之外的交流与互动。另一方面，特定的粉丝群体，如某偶像明星的粉丝，其生活的空间总是跨媒介平台的，常常在微博、微信、抖音、豆瓣、粉丝专属应用等平台上不断切换。数字空间和数字生活的特质进一步造成民族志研究的困难：如何选择一个或多个平台作为民族志观察的站点，如何更好地收集和选择数据，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社群和活动时空的边界，以及如何更细致地识别与分析粉丝作为具体的生命个体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结与互动。乔治·马库斯提出“多站点的民族志”^①，通过追踪研究对象自在的行动，来研究和比较不同站点间的特质，来探究整体的系统如何借由不同的、在地的和具体的设置来形成和协商。然而，卡内达则批评多站点的民族志朝向生产单一总括理论/概念的导向实则滑向了忽略内部差异的整体论，忽视了具体的站点本身如何构建，以及不同站点间的裂隙和摩擦。^②

数字化和网络空间进一步造成对于网络民族志田野站点选择与后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复杂化。对于基于数字空间的粉丝社群而言，站点本身已经逐渐“去站点化”，换句话说，粉丝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互动，使得具体的平台本身已经嵌入粉丝社群的日常行为之中，因而，更重要的并非站点的选择和框定，而是将视点放在粉丝本身的关系网和流动，并基于他们实在的生命体验来进行观照。克里斯汀·海恩因此提出网络本身是内嵌

① George E.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5 (24), pp. 95-117.

② Matei Candea, "Arbitrary Locations: In Defence of the Bounded Field - Si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07, 13 (1), pp. 167-184.

且具身化在日常生活空间之中的。^① 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多样化且逐渐细分的应用程序和互联网服务，以及高度个人化的使用偏好和行为模式，使得数字生活空间本身即充满了多质性，而这样的多质性恰恰是网络民族志和粉丝文化研究者所需要考虑在内并且细致分析的核心特质。因此，海恩强调说，日常化的互联网使用，包括社交媒体的浏览、搜索、内容发布、互动行为，使用的标签、表情包以及即时热门话题等都是网络民族志可以征用的工具并可涵盖在内的范畴。而也正是这样生产性的田野数据构成网络民族志无可比拟的优势。正如丹娜·博伊德^②所言，网络民族志可以被看作网络关系的民族志（networked ethnography），包含了进入文化空间不同入口、行动者之间和实践之间不同的且不断变动的关系，并着力于廓清这些联动的网状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动态联系。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博伊德强调的进入数字文化空间的多样的接口点，同样也意味着网络空间本身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并不总以现实的时间维度作为参考。以明星粉丝为例，他们接入某个明星的粉丝社群，可能始于由该明星出演的电视剧集或电影、某个特定的综艺节目、一段粉丝剪辑的视频或是发布的图文，抑或是借由相熟的线上或线下朋友的推荐。而这些网络中的任何节点并不发生在同一时间点。因此，网络用户或是粉丝的行动路径并不遵循着线性时间逻辑。这样的特性也使得不同的粉丝经常在偶然（重新）发现某段承载着过往记忆的材料之后，获得特别的历史感，如网络用语“青回”（青春回来了）在粉丝社群空间交流中的频繁出现。由此，粉丝文化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也应当将这样流动的时空性纳入考察，来更好地切入和诠释粉丝社群在数字空间中的生命经验。

① Christine Hine, *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p. 1-18.

② danah boyd, "Taken Out of Context: American Teen Sociality in Networked Public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8, p. 54.

二、民族志，粉丝研究者与反身性：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张力关系

对于反身性 (reflexivity) 的呼唤，直接关切着当下粉丝研究中对于研究者位置性和其与研究对象之间权力关系反思的匮乏。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提出的概念“学术粉 (aca-fan)”常常被众多粉丝文化研究者招揽来作为一则免责声明。在其宣称自己既是研究者，也是粉丝社群中的一员的之后，仿佛关于研究者位置性的反思、研究者与受访人和研究对象所处社群和文化空间之间的张力关系、再现与诠释粉丝内部的话语与生命经验的伦理问题等重要议题，皆不证自明。然而，恰恰相反，仅仅贴上如此标签正印证了粉丝文化研究内部对于方法讨论的不足，以及与之毗连的对研究者反身性思考的欠缺。研究者与粉丝身份的黏合并无法足证研究者 (主体) 与粉丝 (被研究者，客体) 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复存在。同样地，当研究者试图言说粉丝社群作为一个整体并须兼顾其内部的异质性时，再现政治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成为萦绕不去的核心议题。因为即便研究者声明自己的粉丝身份，其也只是作为粉丝社群中的一员而存在，因为即便在特定的粉丝群体 (如某明星的粉丝群体) 中，仍有细分的亚社群和权力化的等级关系存在，包括不同的欲望连接起的不同身份，如妈粉、女友粉、事业粉等^①，以及粉丝社群内部因为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等的差异形成的大粉、站姐和普通粉丝^②。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反身性已然成为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一个持续被探讨的概念。就其基本定义而言，它是指作为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一种同情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反省、分析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对抗。作为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关键概念，反身性的含义既复杂又微妙。米恩和伍德认为，关于反身性的说法可以无穷无尽，但反身性仍然无法捕捉，在

① 白玫佳黛：《妈妈爱你：中国亲妈粉、偶像产业、性别和亲密乌托邦》，《传播与社会学刊》2021 年第 57 期。

② Erika Wang, Liang Ge, “Fan Conflicts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Internalised Heteronormativity, Censorship Sensibilities, and Fandom Police”, *Asian Studies Review*, 2023, 47 (2), pp. 355–373.

我们穷尽它之前，反身性早已让我们精疲力竭。^① 首先，根据词源学，反身性一词的英文由两部分组成：前缀“re-”意为向后、再次、反对和颠倒；词干源于拉丁词根“-flectere”，意为弯曲。根据这个词源，可以更容易地阐明反身性的内涵：向反方向弯曲、再次弯曲。这个词由此呈现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反思。有能力的主体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评价，可称之为反思性、反身性。作为对控制研究对象和整个研究过程的全能知识者的否定，研究者建立起自我意识，并应当认识到知识和知识的生产是“处境的(situated)”。^② 由于绝对的客观性并不存在，因此研究者必须在研究中纳入对于自身主体性的审视。这种意识驱使研究者在实践中审视自身的位置和立场，包括性别、族裔、年龄、教育背景等。除此之外，反身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工具，仍然属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范畴，意味着对特定世界的“镜像”和对实践领域内某些要素的自我澄清的努力。然而，反思性也包含质疑和挑战界限的努力，代表了反对理性主义的维度。实证主义将客体与主体严格二分作为客观性的先决条件，而反身性则提供了一套指导研究的地图，从本质上摒弃了主客体二元论，遵循非线性的流动逻辑。反身性的第二层含义则与自我参照和自我反驳有关。反身性不仅要求在准备研究、收集数据和分析过程中具有全面、自觉的意识，还要求关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行动的连续性。正如前文对于基于数字空间的粉丝社群的讨论，在网络民族志中对于反身性的考察意味着研究者对于在一段特定的旅程内自我行动和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持续自觉反思。作为一种揭开研究过程神秘面纱的手段，反身性揭示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反思性可被视为对反思本身性质的反思。^③ 它在先前的反思之上更加激进：反对反思中隐藏的理性前提。首先，激进化意味着反思性是一个非静态的连续体，因此在审视研究的主观体验时，仅仅将种族、性别等身份割裂开来考察，并不能构成对于特权和权力场的完整反思循环。因此，

① Hugh Mehan, Houston Wood,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Wiley, 1975, p. 6.

②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988, 14 (3), pp. 575-599.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6-44.

这些范畴在知识生产时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也十分重要。其次,反身性的流动性要求考虑到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历史和情感,而不是刻板 and 静态地进行知识生产。

然而,这种复杂性也导致了实践反身性的困难。正如乔安·斯科特^①所言,主体的能动性是通过赋予他们的情境和地位而产生的。因此,要探究话语构成的主体,就必须审视尚未被解释的经验。研究者的“自我”,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与被研究者紧密相连。由此,笔者强调尤其在粉丝研究和网络民族志中,情感(affect, feeling and emotion)构成反思自我位置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张力关系的重要的一维。

本·海默写道,情感“会让你暴露自己:那颗欲倾诉的心,发麻的手,声音中的愤怒,眼中闪烁的喜悦”^②。诚然,情感不仅仅是以这种可见的、表面的方式来定义和反映的,它还包括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表达和反应形式。迈克尔·哈特认为,“情动(affect)”的本质横跨于心灵与身体之间,行动与激情之间。^③在这种“跨越”之外,其他理论家如克莱尔·海明斯,继承自斯宾诺莎和德勒兹的情动传统,将情动视为一种政治装置,一种由权力的改变而形成的“强度(intensity)”^④。尽管情动研究内部对于情动有着相当多样化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但毫无疑问的是,关注情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知识者的“自我”,透明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明确知识生产中的主观性。

自我反思意味着要注意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柯克尔和迈尔斯认为,强烈的客观性必须与强烈的反思性相吻合,这就要求研究者将自己置于与受访者相同的审视水平之下。^⑤这一论点还意味着要评估研

① Joan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Critical Inquiry*, 1991, 17 (4), pp. 773–797.

② Ben Highmore, “Bitter after Taste: Affect, Food and Social Aesthetics”,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Dur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8.

③ Michael Hardt, “Foreword: 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sing the Soci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ix.

④ Clare Hemmings, “Invoking Affect: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Cultural Studies*, 2005, 19 (5), pp. 548–567.

⑤ Jill McCorkel, Kristen Myers, “What Difference Does Difference Make? Position and Privilege in the Field”,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3, 26 (2), pp. 199–231.

究者相对于被研究者和社会世界的角色：明确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自我反驳意味着探索自我意识的边界，运用主体间性。正如许多学术粉丝的研究经验所揭示的，研究者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对于网络民族志和粉丝文化研究而言，田野工作应当是一个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情境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构建。研究者如何参与被研究，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融洽的关系和心理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都至关重要。因此，仅仅运用自我意识来反思研究者的立场及其与分析之间的明确联系是不完整的。双层反思性要求研究者有意识地将自己写入文本，写入受众的反应^①，即阐明研究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反身性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反驳。

本文力图阐明并研究反身性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它往往与对反身性的批判有关。由于反身性的含义复杂而微妙，一些研究人员往往只介绍自己的身份，而不深入分析这些身份范畴内所含的特权因素、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研究过程，也不进行自我反思——对“自我”的拷问。然而，这种忽视与其说是由反身性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研究人员试图逃避反身性问题的责任。反身性代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自恋问题与反身性的本质无关。反身性强调的是研究人员如何运用反身性，如何将自我发现和自我反驳与他们的知识生产过程紧密结合起来。

三、结语

随着粉丝研究的勃兴，粉丝与受众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正如冯应谦所言，中国当下的文化景观正经历着社会生活的粉丝化。^② 粉丝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在数字技术影响下加速发展的文化工业中正不断显示着他们强大的协商性力量。尽管在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也竭尽所能地盘剥着其生产消费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然而庞大且多样化的粉丝接入数字

① Margaret Mary Fonow, Cook A Judith., "Feminist Methodology: New Applications in the Academy and Public Policy". *Signs*, 2005, 30 (4), pp. 2211 - 2236.

② Anthony Yh Fung, "Fandomization of Online Video or Television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 (7), pp. 995 - 1010.

空间后，粉丝社群与粉丝活动变得更加活跃也更加复杂。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兼异质性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被不同的粉丝文化研究学者调用。然而，对于如何将民族志更好地应用到考察数字化粉丝社群，研究者在纷繁且充满异质性的粉丝社群中如何反思自身位置性，如何反思自身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则一直少有谈及。本文则着重回应和讨论了上述两重关切。首先，网络民族志对于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的考察应当细致地检索其中交错的网络关系、多质性的（亚）社群与主体间的关系，体察粉丝实在的生命体验。其次，反身性在粉丝文化研究和网络民族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应当运用反身性，透明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明确知识生产中的主观性，而不仅仅是标签化自身作为一则简单的免责声明。以网络民族志进行的粉丝文化研究，应当被视作一次坦诚的对话过程，对话双方——研究者与粉丝平等地共建与维护对话的空间。